

理论周刊

解析理论热点 探寻教育规律

理论高地

邓小平是如何宣传“一国两制”的？

重温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对一国两制的宣传内容，借鉴他当年传播这一理论的有效经验，对于继续推动一国两制的深入传播、廓清相关误解、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全局实现至关重要。

■欧阳奇

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全面宣传，促进了这一构想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施，其历史影响深远。重温邓小平在20世纪对一国两制的宣传内容，借鉴他当年传播这一理论的有效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两制宣传重心经历了“台湾——香港——台湾”的转变

从1977年论及实现统一要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特殊条件开始，邓小平有生之年始终致力于一国两制的诠释。即便是在1997年2月，仍不忘叮嘱来医院看望他的江泽民等领导人，一定要做好香港回归的接收工作。

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最早是由台湾问题而提出的方案。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台湾同胞书》的发布，预示着统一大业被提上日程。1980年，邓小平将台湾的回归确立为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体现一国两制思维的宣传，虽涉及提前解冻的香港问题，总体来看却体现出以台湾为重心的特征。1982年，随着撒切尔夫人的访华和关于香港解决方案“十二条”的拟定，邓小平更多以“九七回归大限”临近的香港为例宣传一国两制，虽然对台湾问题并未减少关注。1985年后，他依然就基本法起草中的疑问做了诠释，并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但更多以台湾问题为阐述重点，并集中宣传了香港之于台湾的垂范意义。台湾问题重新成为邓小平论述一国两制的主要对象，是因为：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基本铺就了香港回归之路；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增进了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台湾“谋求统一和分裂的力量都在发展”，变数增多；坚持“一中”原则的蒋经国已至垂暮之年，争取他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从宣传对象演进的轨迹来看，已在香港成功实施的一国两制模式，实际上最早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量身定制的合理方案。“台湾不是香港，不适用一国两制”的说法是无视历史事实的。

在传播中丰富一国两制理论

在“一国两制”科学名词提出以前，邓小平就不同程度地多次宣传了统战方式从武力解放到和平共处的转变，统一模式从一种制度向两种制度的创新。而且，他在宣传这一构想的过程中，不断充实着基本框架下的内容。如在查济民建议应培养管理香港的人才后，邓小平就及时提出了在香港成立政治性团体参与管理并培养人才的目标；面对投资者和香港同胞担心回归后现行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会被改变的多重忧虑，他引领了“五十年不变”具体政策的出台，并多次诠释了这一政策提出的原因、依据和目的等；针对香港同胞因惧怕政策有变而希望基本法细化各方面工作规定的要求，邓小平提出了基本法不应

太烦琐，规定过细反而容易生变的科学原则。可见，邓小平相当重视宣传一国两制过程中受众的反映和心声，并据此进行相关阐发，丰富和完善了一国两制的理论体系。

在与错误倾向斗争中促进一国两制的传播

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不少阐发，是同错误理解一国两制甚至阻挠一国两制运用的某些倾向或言行而进行的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如论及台湾问题的解决方针时，邓小平多次针对美国的种种干涉，又正言辞地表示：大陆提出的实现两岸统一的条件“都是合情合理的”“提出九条建议之后，美国更没有理由向台湾提供武器”、将台湾当做“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平统一方案提出之后，美国不要做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事，等等。邓小平在谴责《与台湾关系法》为中美、台关系投下阴影的过程中，声明了一国两制是两岸实现统一的最佳选择。针对台湾当局的做法，邓小平多次指出：所谓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太不可能，太不现实，也太不谦虚了；“一国两府”论的要害是回避了谁为中央政府，从而造成了笑话。这些表态有力地论证了一国两制才是统一两岸的可行方案。

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通过充分驳斥英国在谈判过程中的无理要求，坚持了中方一国两制的底线。如明确表示“英国想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不讲治权，讲某种程度的参与管理”也行不通；“中英谈判没有‘三脚凳’，只有两脚”，等等。这些高密度的宣传和铿锵的话语，使中国在谈判中掌握了更多主动权。1990年，邓小平针对英国在香港推行所谓“政治民主化”的险恶用心，重申了“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的立场，坚定了香港同胞对一国两制实施的信心。他还针对香港个别同胞的片面之见，指出大陆反对自由化并不意味着一国两制方针的改变；强调认为香港的事情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央保持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指出香港进行普选不一定有利，不能保障由爱国爱港人士治理香港，普选“要一步一步来”。他对这些具体方针的明确，有利于增进同胞对一国两制的深入把握和全面了解。正是邓小平指出了“三权分立”主张的荒谬之后，基本法规定了香港以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互相制约的独特政治体制；规定了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应坚持循序渐进原则，“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为香港回归后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体制保障。

重视舆论领袖在一国两制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邓小平在宣传一国两制过程中，十分重视舆论领袖的传播效应。舆论领袖既是舆论传播的受众，也是能影响更多受众的



禹天建 绘

中介和桥梁。与邓小平谈论一国两制内容的客人，基本都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某一领域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又有着深入接触大众的优势或便利，从而能促进这一理论在更大范围的传播。比如，香港总督麦理浩回去后，“传达了邓小平保证不损害香港投资者利益的信息”，“第二年香港股市和房地产价格飙升”。显然，在认同中央政府措施的基础上，民众的不安和忧虑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又如，香港知名人士金庸受到邓小平接见并着重谈论统一大业问题后，邓小平和金庸的谈话记录被香港《明报月刊》刊发并数度加印，金庸本人将一国两制形容为“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关注一国两制的热情。作为香港高等教育领头羊——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见到邓小平之后深知关于香港回归的“中国的政策不失为最好的政策”，对本土同胞的影响可想而知；华侨杨力宇见到邓小平后，成为海内外轰动一时的新闻，他撰写的《邓小平对和平统一的最新构想》被美国纽约数家报纸全文转载，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的谈话是和平统一祖国的最新构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议”；被邓小平接见并委托传达允许台湾退役军人回大陆探亲任务的陈香梅，在促进两岸民众的交流和接触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长远来看，她对于赴大陆探亲的台

胞更真实地了解一国两制的构想自然功不可没。

邓小平的权威诠释和有力宣传，使一国两制在海内外、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和赞誉。而且，他屡屡在重要的关节点，圆满地解决了坚持和贯彻一国两制的实践难题，促进了这一伟大构想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运用，推动了一国两制理论体系的广泛传播。然而，从当前香港的普选之争来看，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殖民统治，以及与祖国腹地的多年分离，再加上西方国家某些势力的渗入，一国两制深入香港民心的工程并非一劳永逸的过程。

香港问题研究专家齐鹏飞指出：“香港当前针对政改实施方案出现各种乱象，根本症结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香港社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对香港基本法长期存在模糊、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和认识”，因而有必要“回到‘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有关思想论述中，来追本溯源、正本清源，以廓清和指示未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路径”。由此可见，重温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对一国两制的宣传内容，借鉴他当年传播这一理论的有效经验，对于继续推动一国两制的深入传播、廓清相关误解、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全局实现至关重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香港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学者观点

云教育：高校德育新平台

不管我们是何种态度，云教育已悄然走近高校，为高校德育发展提供了新平台和途径。

■张宝君

云教育作为一种线上线下联动的新型教育模式，突破了传统教育的信息区域性界线，打破了原有各自为政的壁垒，在满足学习者各种需求的同时，不仅体现了其与传统网络教育、在线教育相比的平台优越性，更凸显了其技术的先进性。作为网络教育“智能”钥匙的云教育，不仅为现代教育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为高校德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云教育是新教育理念、思路在新信息技术下的具体体现，而理念更新更是成为高校德育改革的催化剂。高校德育的发展要求是“即时性、易变性、高效性和覆盖性”，而云教育恰巧符合上述要求。同时，云教育多元、灵活、丰富的特点，与90后大学生时尚随性的生活态度相契合，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拓展了他们的想象空间，调动了学生获取信息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对知识的创新性，凸显了学生的德育主体地位，有利于高校德育“全天候”“全方位”目标的实现。因此，高校德育应合理利用云教育，以“共同”

“共融”的德育价值思维方式，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强化德育的时代性、服务性和引导性，实现从课堂灌输向“无边界”移动数据教育引导的转变，真正发挥高校德育的“向导”和“灵魂”作用。

云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的平台，更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情感交融、无缝对接的黏合剂。在云教育背景下，学生通过数据云可以获取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学科知识，教师不再是“蓄水池”，学生也不再是“装水罐”。云教育快捷性、虚拟性、平等性、交互性的特点，实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身份的同等化，通过师生互动研讨，为受教育者提供平等交流的平台，促进教师和学生群体共同发展。在现代社会中改变人们尤其是大学生的认知、思维和价值取向，更需情感交融、彼此渗透。因此，高校德育要以尊重学生、理解学生为出发点，建设情感交流反馈平台，充分利用德育的数据云，记录和挖掘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细节；将德育内容融入人与学生共同评论时事政治、校园热点、生活逸趣当中，亦可以让教师、学生和家長走进“云德育”特设的交流平台，参与教学、管理、学习、

娱乐、交流等环节，实现教育一体化。

云教育不仅突破了高校“信息孤岛”现象，而且成为德育资源整合的助推剂。德育的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基于“云”技术建立的“集约式”大德育体系。“云德育”提供的是一种虚拟的教学环境，学习者可以通过任何“云端”设备获取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个性化学习。“云德育”犹如时下火热的淘宝网和网易云存储一样，学生在“淘宝”中根据个人兴趣和关注点选择“服务”项目，实现自我需求的满足。因此，高校可以通过“云德育”对各种分散的关系化、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针对现状，预测发展结果和趋势，使高校德育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静态变为动态，不受时空限制，进一步提高时效性和针对性。高校德育云课程建设，要以学生为中心，按照学生学习基础和兴趣选择学习内容；以协同教育为驱动，以各类教育资源对接为重点，以提高资源的共享效率为目标，加大优质德育资源的利用与开发，通过云技术把分散的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促进优

秀文化、德育思想的汇流、激荡，从而促成德育的精致化、权威化、时效化。

云教育不仅丰富了高校德育形式，创新了方法，拓展了空间，而且成为高校德育的“预警雷达”。云教育背景下，高校德育要在数据汇聚、过滤、分析和挖掘的基础上，对教育与服务效果做出研判，为教育决策者提供参考，为师生提供针对性的优质服务。云教育对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预警功能，教师可以通过数据云随时关注学生的动态，及时发现、引导、解决问题，有效控制问题的扩大化。

无论我们是何种态度，云教育已悄然走近高校，德育需要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正是为云教育所囊括的。云教育的渐行渐近，为高校德育发展提供了新平台和途径。高校必须充分合理地利用其先进性，搭建德育“云平台”，从而更加贴近视频化、教育资源均衡化和智能设备优质化的移动教育方向，使云教育在提高人才质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等事业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学生就业工作处）

论道说理

文化建设关系国家发展，文化品质关乎国家品质并决定个人幸福指数和幸福层级。

展现“文化中国”的魅力与优雅

■傅守祥

文化是国家的精神旗帜，其生存与发展品质是文明程度的标尺。只有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在“品质为王”的创新时代，文化发展必须以人为本、指向向人的生活品质与生命品质的提高。当代中国亟需解决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如何跟上经济“硬实力”的发展，以构建新的社会平衡并培育更加良性的发展机制与文化生态；建立与时代相符合的“思想市场”以及更好地坚守制度正义，在新型生态文明基础上展现“文化中国”的魅力与优雅。

文化创业常比经济政治创业更复杂，其意识形态性常使文化创业更需要探索、决断与开拓，其精神滋养性更需要为生命立心、为民族护魂、为万世守神的深谋远虑；慎用、滥用公共的文化权力，将延误文化发展的机遇，浪费公共文化发展的资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明确了“制度正义”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倡导用健全的制度保护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聚焦文化建设的最新议题，紧扣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大力推进文化正义的全面落实，是一项极富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

世界因文化而温暖、因文化而别具声色。先进文化更是人们获得理想信念、生存意义、终极关怀的精神家园，它可以制衡市场逻辑、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与扭曲。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日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建设关系国家发展，文化品质关乎国家品质并决定个人幸福指数和幸福层级。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文化的复兴与文明的养成。从更宽广的视野“回到马克思”，应对中国面临的两极分化严重、自然环境恶劣、人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等问题；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审视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安全、文化的国家治理政策体系更新与治理能力提升、文化产业的短平快与文化事业的精神凝聚等难题。消费时代需要人文价值关怀，更需要在全球化加快建构本土文化的精神支撑、完成价值重塑再整合。解决文化内容质量问题要制度正义的纠偏又要文化自觉的深入，要切实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增强文化创新机制。

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没有文化的整体复兴作为拱卫、没有文化的深度活力进行反哺将难以为继。中国要建设文化强国，必须秉承科学发展观，大力改善文化生存的制度环境，以更大政治智慧解放文化创造力，保障文化生成的创新性、多样性并确保文化发展的先进性、厚重性。推进文化正义，首要的是加强公共政策的程序正义，加快公共文化立法与文化市场治理的修法。维护文化平等、保障文化自由、促进文化分享是文化正义的内在价值，尊重文化形象、优化文化环境、净化文化市场是文化正义的外在价值。文化正义巨擘包括文化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性及文化享有的平等性，也包括文化生态平衡和文化品质的提升。

犹如恶补硬实力的经济，当前我们亟需通过制度正义、体制调整与实践创新等充实文化的实力、提升文明的水准，尽早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与和平崛起。文化引领及其发展战略必须合法合规，合乎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惯例。多年的文化体制改革成效不大、文化生成机制创新不足，主因是旧体制的禁锢和制度正义的缺失。宽容的对话和协商式治理将推动社会公平与制度正义的实现，媒介素养提高与底线伦理的共识有助于文化内涵的丰富与精神品质的锻造。

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特别是价值理念、国民素质、国家形象等是否有竞争力，能否赢得更多的国际认同。中国应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深化文化认同，以强大的软实力形成国际亲和力与辐射力。建设文化强国，当代中国要解决文化道统接续、文化走出去与国际话语权争夺、大国形象塑造与文化正能量传播等难题。在此基础上，接续本民族的人文传统、融合外来的先进文化，进而才有可能培育出中国的新文化与新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魅力展现与价值传播，寄望于新时代文化正义的巨擘与文化品质的提升。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